

翻译的文化资本运作

——近代翻译家伍光建研究

肖 娴

摘 要: 翻译学对文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借鉴夯实了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翻译研究由原文本与译本的语法、句法、语篇等语言层面的对比分析转向宏观上影响文本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研究。本文借鉴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探讨近代翻译家伍光建的译介生涯中翻译的文化资本的运作过程。翻译的文化资本是文化翻译场域内行动者的出发点, 与译者的翻译动机、社会轨迹 (social trajectory)、翻译选材及策略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与互动, 其运作是译者、赞助人翻译动机产生后进行译本文化再生产并追求译本接受与利润的过程。考察翻译的文化资本运作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考察翻译过程中各种权力关系的协调和适应, 本文分析了文化资本的3种形式对近代翻译家伍光建翻译行为的影响, 并阐释翻译与文化资本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布尔迪厄理论; 文化资本; 伍光建; 译本接受

[中图分类号] H315.9

DOI: 10.12002/j.bisu.2016.0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 (2016) 03-0052-09

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翻译研究的界限从语言和文本分析扩展到复杂的文化构成符号的整个网络, 这一多学科化的趋势正促使学者把多种学科的理论 and 资源结合起来, 而学科间的碰撞交融又产生新的见解 (Gentzler, 2001: 203), 译者则需要把握他者文明中体现其文化资本的文本, 在保留原文本固有文化性质的同时, 不减损原文的意旨和趣味, 以增进文化间的了解与融合。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分析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译者行为, 能够让中国翻译文学史鲜活起来。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又译作布迪厄) 从社会学角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他的文化社会学理论涉及的研究范围也包括语言学、文学和美学, 对文化生产的复杂过程有很强的解释作用。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学科共建项目“粤籍翻译家伍光建研究——布尔迪厄社会学视角”(项目编号: GD15XWW10) 阶段性成果之一。

翻译在社会系统中如何运作以及如何被调节，是翻译社会学转向过程中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被翻译学术界借鉴，用来分析翻译的生产、传播及接受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运用的各种社会制约因素，从社会学角度对各种翻译现象及其社会机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阐释译者主体性、翻译选材谱系以及译者翻译行为在历史演化进程中时代意义的有效理据，丰富了翻译学的理论维度。翻译界借鉴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探讨翻译作为文化生产的社会调节活动和翻译过程的特征，为翻译学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考察翻译过程中各种权力关系的协调和适应。

布尔迪厄最初通过对法国教育体制的研究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用来解释不同社会阶级出身的学生的学业差异。在他的纲领性文章《资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中，布尔迪厄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并将其进一步划分为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 3 种形式（Bourdieu, 1986: 241-258）。本文将从文化资本的不同形态来考察翻译家伍光建在文化资本运作过程中如何产生翻译动机、实施翻译选材、选择翻译策略以及实现翻译利润。通过阐释翻译与文化资本的互动关系，从更广阔的社会学角度来了解伍光建这位曾在翻译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翻译家。

二、文化资本及其形态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对文化如此定义：“作为复杂的整体，文化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习俗以及由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才能”（高宣扬，2004：19），而资本则是社会实践工具，非物质化的资本形式可分为文化的、社会的、象征的资本，布尔迪厄认为这几种资本具有可传递性，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换。其中文化资本又分为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就翻译来说，文化资本是译者对双语能力、翻译策略等文化资源的占有，在译作生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行动者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将他们一生中的社会实践逻辑体现在行动气质与习惯中。与经济资本不同，身体文化资本的传递形式主要通过耳濡目染，依靠内化受教育者的惯习得以传递，它的积累是点点滴滴潜移默化的，即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和修养的那一部分，如书香门第的家学渊源便是一种可传递的身体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以一种内在的形式对行动者产生影响，表现为一种性情倾向系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社会轨迹。翻译的社会学视角涵盖

了译者的人生轨迹、职业生涯、语言文化规范等,这些因素在分析译者的翻译动机、文本选择、对原文的阐释以及翻译过程中的译述、译意、改译、译注、编译、缩写、选译等策略的取舍及译文在海内外的传播与接受等环节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布尔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3种基本形式,行动者获得与继承这3种文化资本的渠道不尽相同。有的文化资本在年幼时期的家庭体验中获得,家庭是文化资本最初的生产场所。父母的文化素质和兴趣爱好的熏陶可以让孩子在最初的人生经历中不知不觉地形成良好的文化趣味。

出身贫寒的伍光建年幼时曾在家乡广东新会麦园村乡读私塾,后投考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每月能得数两纹银伙食费”(邹振环,2012:254)。1886年经其师严复特别奏请,伍光建以优异的成绩被派往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学习船政,留英期间,伍光建对西方文学、哲学、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于20世纪初年开始着手译介西方小说、历史作品。根据伍光建的教育经历和人生轨迹可见,伍光建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主要通过接受系统性学校教育获得。伍光建接受了中式和西式的良好教育,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个人才能,然而,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处于没落中,伍氏并未得到重用。1943年,伍光建在上海去世,老友张元济手书挽联“天既生才胡不用,士唯有品迺能贫”,上联即是对北洋军阀政府不重用海军专门人才伍光建的愤慨,出身北洋水师学堂,又在英国学习船政的伍光建归国后却“学非所用,用非所学”(郑振铎,1943)。下联“士唯有品迺能贫”则是写伍光建性情淡泊,不为世俗浮华所动,郑振铎称之为中国式的“浩然有正气”的士大夫代表之一(同上)。辞官后的伍光建以译书为业,生活清苦,据伍光建外孙女邓世还回忆,外祖父一生说的是家乡话,很严肃,说话很少,晚年几乎每天都在书房度过(邓世还,2009:153-158)。伍光建一生勤勉,译著等身,翻译生涯跨越清末民初翻译文学的高峰期和现代文学翻译的初期。其译著“所涉范围甚广,文、史、哲、教育乃至自然科学教材等,近亿字”(伍蠡甫,1980:1-2)。表现为行动者的个性化秉性的是身体化文化资本,是在行动者身体内长期稳定地内化形成的。身体文化资本的投资包括时间的投入和社会建构性的投入,行动者需要承受某种匮乏甚至牺牲。客观化文化资本则是一种“物化”资本,它与身体化文化资本相关联,需要行动者将身体化文化资本投入文化生产场中去,才能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发挥作用,这恰好解释了译者作为行动者通过翻译过程进行译本的文化再生产,方能获取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过程。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则是身体化文化资本和客观化文

化资本的中间状态，是以社会公认的方式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制度化，因此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文化资本是文化翻译场域内行动者的出发点，与译者的翻译动机、社会轨迹、翻译选材及策略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与互动。

三、伍光建译介的文化资本运作

1. 近代文化场中的翻译与译评

近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自然科学，而后是社会科学，最后才是文学。文学的译介从文学观念、叙事模式和文学语言建构等方面对后来的近代小说的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如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等。“翻译者如前锋，自著者为后劲”（黄世仲，1908），翻译小说对近代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已是不争的事实，翻译小说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模仿借鉴的样本。清末民初的翻译高峰期间，“西学东渐”的文化资本流动数量空前，规模之大，令人震撼，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起初的翻译小说有许多不署译者姓名，可见当时小说翻译这一创造性劳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译作风行及小说地位的提高，小说翻译才逐渐被认可，随后译者不仅开始署名，更有假借他人译作以扬名的个案。译者出名后，身份得到认同，才逐渐积累文化资本并确立个人风格。伍光建以白话文译介的西方小说被目的文化场接受和消化，为其自身积累一定的文化资本后，确立起“翻译界圣手”的声望，并于1933年开始辞官专职译书。但此时中国的自由译者阶层尚未形成，翻译只能作为业余爱好，并不能成为谋生手段，因此文学翻译场域亟需完善的商业机制与结构化的出版环境。

与此同时，翻译小说风行后，随即出现了译评，有对原作的评论也包括对译文的评价。时人的译评重“文笔”而轻翻译能力，即把译作当著作评论，如林纾的译作就因“译笔流丽”而受到追捧。而直译则常被用来与“诘屈聱牙”、“味同嚼蜡”等词联系在一起。小说界以“译意”为主，译者改用中国地名，改变小说体例，采用章回体回目以迎合读者趣味，删去译者认为不合国情的情节，甚至增加自行想象的情节并在译作中添加译者的议论。以上种种，究其原因，与当时译者的外语水平受限及晚清盛行的一字一句对译方法有关（陈平原，2010：39）。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文人读者对外语的掌握程度的提高，译评开始注重对原作的准确译评。

2. 文化资本与伍光建的翻译行为

清末民初翻译域外小说的译者主要分为三类：外交使节和经商、旅行者；留学生；译书局专职译员（陈平原，2010：25）。在当时这3个群体的总人数绝对数量并不多，留英学习海军船政的伍光建即属于留学生这一类。在清末民初，翻译还是以译述为主流的时代背景下，译述多而庞杂，在作品选择上也良莠不齐，大多数译者根据读者市场和个人爱好选择的翻译对象多是外国三流的文学作品，名家名著翻译不多（谢天振、查明建，2004：17），而伍光建眼光独到，选材严格。梁秀琴（即梁实秋）曾说，“伍译小说居多，批评他的都说他的译笔流利，酣畅有余，这是一个显然的优点，且是读过他的译本的人都能明白看出的。但伍译还有一个优点，便是他的选择很严。凡是他所翻译的小说，都是有些本身价值，值得介绍的”（梁秀琴，1933：16-20）。伍光建所选译的作品多成为后世经典，如大仲马的《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二京记》（今译《双城记》）、《劳苦世界》（《艰难时世》）、夏洛蒂·勃朗特的《孤女飘零记》（今译《简爱》）、霍桑的《红字记》（《红字》）、萨克雷的《浮华世界》（即《名利场》）等，大部分收录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对照名家小说选”。该丛书收录的40多种西方名家小说节本，所涉主题丰富，而伍光建的很多译作后来则成为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经典化构建的基石。伍光建所译的《侠隐记》、《法宫秘史后编》、《续侠隐记》等情节曲折、故事有趣的历史小说，受到读者欢迎，他的白话文翻译“略带文言腔、句子简短精炼，朴素而又风趣”（陈平原，2010：46）。林纾的“古文改写”式译作广泛流行时，伍光建则改用白话翻译，陆续在《中外日报》发表，读者为之“耳目一新”（伍蠡甫，1980：1-2）。伍光建的教育背景、海外求学以及担任清朝政府专员出使欧美、日本等国的经历，都构成了他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反过来又会促成译者惯习的生成。例如在选词上，伍光建将“colonel”译为“大佐”这一日本特有军衔，就与他出任日本大使随员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

翻译的文化资本运作模式除了翻译素材的选择还包括翻译策略的使用，主要分为赞助人或译者的翻译动机、文本选择和翻译以及译本利润获得3个阶段。1904年到1909年间，伍光建曾向张元济提及用白话翻译小说的打算，张元济非常感兴趣并一再鼓励。《侠隐记》出版于1907—1908年间，早于“五四”白话文运动十余年，被学者称为“前瞻式”的白话文翻译。且伍光建翻译小说的选材标准与严复、鲁迅等明显不同，他的译作几乎不涉政治，甚少功利色彩，为了使民众“了解西洋”，他较少受意识形态左右。由于当时原文本的流传并不如今天这样广泛，译者多从英文或日文转译，如伍光建翻译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的《侠隐记》(*The Three Musketeers*, 今译《三个火枪手》), 就是从英文译本转译的。有些文本在被译成中文前就已被改写、删减得与原作有相当大的出入, 加之当时并无完善的翻译规范, “译意不译词”, 任意增删原文的情况很常见, 译者在出版或连载西方小说时多不标明原文出处。伍光建在翻译时, 也有选择地删减了历史典故或文化意象, 对小说的语调、句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和置换。

伍光建翻译了近亿字, 却从未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翻译观, 这也是这位开译界白话翻译先河的多产翻译家沉寂于浩瀚译史不为后人熟知的重要原因。但他的翻译思想完整而系统地体现在了他译作的“译者注”中。译语词汇、“译者注”等伴生文本在翻译文本中不仅仅是翻译与阐释, 有的还有文学批评的功用。1927年, 他以《孤女飘零记》为书名将《简爱》从英文节译成中文(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译者序”中, 伍光建这样评价原作, “此作不依傍前人, 独出心裁, 描写女子性情, 其写女子之爱情, 尤为深透, 非男著作家所可及。……此书描写女子爱情之中, 同时并写其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气概, 为女子立最高人格”(伍光建, 1935)。可见译者在文学翻译场域中有着多重身份。综观伍译西方小说中的“译者注”, 主要有3种情况: 第一, 解释原语文化词、阐述其语言风格和叙事方法; 第二, 介绍小说背景、分析情节或人物形象; 第三, 挖掘小说的思想, 做出价值判断, 抒发作者感想。作为一种伴生文本, 译者主要以读者的期待视野和主流意识形态为导向, 这种导向有可能会对译文读者理解原作内容和作者意图产生一定影响。

3. 伍译的译本接受

茅盾对伍光建的翻译评价颇高, 并于1924年和1926年分别将《侠隐记》和《续侠隐记》分段并添加注释和标点, 以符合新式阅读习惯, 《侠隐记》的白话语体风格和现代语言魅力很快得到了读者的认可, 后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发行, 作为“新学制”语文补充读本。他还将 *Jane Eyre* 的伍光建译本和李霁野译本进行比照研究。他认为, 《侠隐记》虽为删节本, 但原作的主要人物面目得以保存, 甚至有时译本比原作还要简洁明快, 便于一般的读者阅读, “但伍光建的删略使得他的意译过度了, 原作的精彩之处的意味损失不少, 尽管他的略译在推广这部作品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转引自奚念, 2009)。胡适也认为, “君朔(伍光建)所用白话, 全非钞袭旧小说的白话, 乃是一种特别的白话, 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故我最佩他”(转引自郭延礼, 1998), 这成为当时翻译批评界的一段佳话。尽管如此, 20世纪30年代对伍光建的译作语言和翻译手法的指摘和评论也不少, 也从侧面反映伍译西方小说

在当时的影响颇大。通过对1920—1945年间民国报章、期刊中伍光建译作及译评的统计,我们发现对伍光建译作的文本批评与指摘主要集中在“避难就易、化繁为简、不懂原文、删削错译”这些关键词上。以下仅举几例,以管窥当时的译评全貌。

叶维对伍译《约瑟安特路传》有过具体而微的解读,并指出译作中的许多问题。

(1)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原名*The History of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 and his Friend Mr. Abraham Adams, Written in Imitation of the Manner of Cervantes, Author of Don Quixote*(《约瑟夫·安德鲁斯及其朋友亚伯拉罕·亚当斯先生的冒险故事》,今译《约瑟夫·安德鲁斯》),伍氏未译出全名,也未作任何说明。叶维认为,“遗漏或出无心,删削却是有意;二者的结果,都对不起原著。”

(2) “... without having any regard to the lovely part of the lovely girl which was on his back...”一句,伍氏认为有伤风化,将其完全删去。

(3) “... did ever mortal hear of a man's virtue?”伍译为“世人哪里有听说过什么人是有道德的?”,文中主人公约瑟拒绝贵妇的求欢,要保持自己的贞洁,夫人认为太不近情,所以生气,应译为:“谁听说过什么男人的贞操?”

(4) “It is not for me, answered Joseph, ‘to give reasons for what men do, to a gentleman of your learning...’”伍译:“约瑟答道,他们为什么要骗你这种有学问的人。我却说不出来”,叶维将其纠正为“我不配向你这样有学问的人,解释人家的行为。”

(5) 文中人物故意用法语说的句子,删去不译,导致译文不连贯。(叶维,1934)在评论伍译《洛雪小姐游学记》(今译《维莱特》,夏洛蒂·勃朗特半自传体小说)时,叶维这样概括伍译的删削,“凡是他所译部分,都是非常浅显:稍微深刻或复杂一点句子,都被漏译。如“解剖心理”(即心理描写)和描写风景的句子,无一不在淘汰之列:所剩下的,只是一个故事的钢筋水泥,砖石都已拆去”(叶维,1933)。

梁实秋也曾撰文评论伍译《洛雪小姐游学记》,伍光建在第三十六回末尾申明“恕不照译”,梁实秋认为删削太多,有潦草塞责之嫌。对于伍译的删削部分,梁实秋说,“伍先生所认为不妨牺牲的废物,有许多,从我们看来,却是很好的描写,或且流露着原著所愿表示出来的意见,经过了这样的翻译与删节,原作不免为之减色,似乎有点可惜”(梁秀琴,1933:16-20)。对于译本中的错误,梁实秋也一一指出并予以纠正。举例如下:

“A trickling of water caught my ear” 伍译为“觉得眼睛有水点子”，梁实秋译为“我听见滴水的声音”（第一回第八页第一行）；

“One February night” 伍译“有一天星期五晚上”，梁译为“一个二月里的晚上”（第五十页第四行）。

这些译评见诸当时主要报刊如《图书评论》、《观察》等。由于当时翻译规范尚未形成，翻译评论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基础或统一的标准，译评多为比较主观的印象式点评，有的甚至出现人身攻击的词句，评论者以讹传讹，或将正确的原文曲解、改错。不过，翻译批评也促进了译作的接受和传播，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翻译规范的完善，同时也给译者带来提升其在文化翻译场声望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结语

本文从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化资本的不同形式和运作模式梳理了近代翻译家伍光建的译介历程，试图让这位曾在清末民初译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而又沉寂于浩瀚译史中不为人熟知的翻译家浮出历史地表。通过梳理史料、文本，研究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资本运作和翻译活动中参与者的行为与互动，解读译者的翻译活动在社会中的作用，有助于从新的视角考察翻译过程中各种权力关系的协调和适应。

参考文献：

- [1]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A]. In Richardson J.G. (Ed.). *Handbook of Theory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C]. New York : Greenwood Press, 1986 : 241-258.
- [2]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Sydney :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 203.
- [3] 陈平原.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25, 39, 46.
- [4] 邓世还. 伍光建生平及主要译著年表 [J]. 新文学史料, 2009 : 153-158.
- [5] 高宣扬. 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 19.
- [6] 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7] 黄世仲. 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 [J]. 绘图中外小说林, 1908, 2 (4) : 23-28.
- [8] 梁绣琴. 伍光建译洛雪小姐游学记 [J]. 图书评论, 1933, 1 (11) : 83-89.

The Manipulation of Translation-cultural Capital —A Case Study on WU Guangjian's Translation

XIAO Xian

(Guangdong Universtiy of Petrolchemical Technology, Dongguan 523808,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s reinforced by theories from literature,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ology, which have partly established and formed the found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focu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hanges from the contrast and analysis between source language texts and target language texts from the research of grammar, syntax, and discourse to the study of influential factors such as society, culture and history on a macro level. Using Bourdieu's social theory,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manipulation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capital elements in WU Guangjian's translation career. The cultural capital is the translator's starting point in this field and it is closely interacted with and related to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ng motive, social trajectory, and translation choice and translation strategy. The manip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is the process when the translator or/and the patronage employ(s) the materials to be translated and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im to reproduce cultur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pursue the acceptance and profit of translation texts. This article draws upon Bourdieu's social theory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the three forms of cultural capital on WU Guangjian's translation. Furthermor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nslation behavior and cultural capital are elucidated.

Keywords: Bourdieu's social theory; cultural capital; WU Guangjian; acceptance of TT